

田野经历与 书斋思考

新疆社会学调研文集之一

主编◎李晓霞

副主编◎吐尔文江·吐尔逊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田野经历与书斋思考

——新疆社会学调研文集之一

主 编 李晓霞

副主编 吐尔文江·吐尔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经历与书斋思考 / 李晓霞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228 - 14562 - 1

I. ①田… II. ①李… III. ①新疆—概况

IV. ①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7225 号

责任编辑 若 贤

封面设计 王世杰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序

社会学起源于 19 世纪中后期,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涉及社会结构、人口变动、社会组织、民族关系、城市发展、乡村变迁、社区成员互动、婚姻家庭与性、信仰与宗教、现代化等领域。重点放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以及当代社会如何演进变化的过程。社会学家关心社会群体的特征、群体间或成员间的互动影响及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效果。社会学者经常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缺乏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空洞的;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则是盲目的。19 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其著作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创立了实证主义学派。之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出版了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在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的头 20 年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一些大学先后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创刊了《社会学学报》,设立了社会学学部。这期间涌现出了一批社会学家,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帕累托、马克斯·韦伯等人。

我国的社会学是在 19 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获得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名的社会学家和优秀的成果,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是我国早期著名的社会学者。后来,在特定的国内环境中,社会学经历了较长的调整与停滞期。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社会学获得重建,目前国内各大综合类院校都设有社会学或社会

工作管理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各省、区、市社会科学院大多设有社会学研究所。全国建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一级学会,中国农村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会等多个二级学会以及一批专业委员会。各省也普遍成立了自己的学会。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还建立了若干实体性的和非实体性的相关研究中心。

新疆的社会学研究整体起步较晚,研究及教学机构主要设在各大学,专设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仅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但其他大学均有一些教授社会学或相关专业课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师。相对于其他学科,新疆的社会学研究力量整体较弱。新疆大学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1998年又建立了社会学教研室。2006年,新疆大学成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院下设社会学系等4个系,以及政府管理与政策分析、新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等5个研究中心,续设有社会工作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社会学硕士专业。新疆师范大学2004年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谷苞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一生从事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在老院长的带动下,新疆社科院从开始成立时起,研究人员就有着积极参加社会调查的意识。上世纪80年代初,社科院派数位研究人员参加北京、武汉举办的社会学讲习班,进行社会学知识的启蒙。80年代末在本院民族研究所下设社会学研究室,曾经在该室工作的研究人员后来有3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分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江西财经大学工作。2007年5月,新疆社科院在社会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同年,新疆社会学会挂靠在社会学研究所。

目前,社会学研究所有7名工作人员,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4人。研究所成立4年来,由所里研究人员主持立项的课题有1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自治区社科基金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子项目2项,接受并参加了世界银行委托项目4项。完成科研成果100多万字,包括3部著作及数十篇论

文,还有多篇专题报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新疆的社会稳定、族际关系、社会政策、社区管理、人才建设、人口研究、青年状况、女性发展等方面。社会学所成立时间不长,研究人员或者过去没有专门从事社会学研究,或者是新进入研究队伍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但大家怀着关注、参与新疆改革发展的一片热忱,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希望能在新疆大发展、大开放、大建设中以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同时也把握好个人事业发展的机遇。

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调查研究为己任的基础性学科,对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具有独特的认识、解释和指导作用,同时,社会学又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要随时保持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同步性、协调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社会变迁全面深刻,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学研究大有可为,社会学者要不断地研究新问题,从而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厦增添新知识,创建新理论,以获得旺盛强大的生命力。相信新疆的社会学研究大有可为。

这部文集收录了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近年来的9篇调研成果,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衷心祝愿社会学所的同志们再接再厉,产出更多的优秀成果,贡献给社会和人民。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1年10月18日

目 录

序	
走进田野	
——南疆汉族农民调查片断	李晓霞(1)
从出生塑造未来	
——新疆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调查.....	吐尔文江·吐尔逊(54)
我们一直在和社会共同成长	
——新疆青年生活现状访谈浮绘.....	张 敏(87)
“半边天”的美丽力量	
——北疆片区妇女及妇女组织维护地方稳定实录	
.....	张 敏(111)
第三方力量的成长	
——以新疆妈妈互助协会为例	郭德海(133)
飘扬的红丝带	
——新疆艾滋病防治情况调查	吐尔文江·吐尔逊(155)
行政化与内生性	
——社区调研散记	郭德海(181)
客串于新疆的都市之间	杨富强(214)
行走在新疆乡村的大地上	杨富强(232)

走进田野

——南疆汉族农民调查片断

新疆的全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许多没有来过新疆、不了解新疆的内地人,常常很惊奇他所见到的新疆人怎么长得和他一样,而且也说汉语,这让新疆的汉族人感到可笑和无奈,感叹新疆的偏远让这么多人不了解新疆。实际上新疆的汉族人口占到全疆人口总数的39%,是新疆人口第二大民族,第一位的是维吾尔族,占全疆总人口的46%。但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新疆南部维吾尔族人口比重大,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则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三地区共有793.96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88.6%,汉族人口占10.2%。南疆的汉族人口多居住在城镇和兵团辖区,生活在乡村的人很少,以至于一些新疆人也以为南疆农村没有汉族人。2010年1月,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的汉族居民”,我与课题组成员^①在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地区11个县11个乡的12个村对汉族居民进行调查。

调研方法和调研点的选择

这个课题被我界定为是一个有关汉族人口迁移到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以及迁移后的生产、生活、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关系的描述性研究,即主要是对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当

^① 参加本次调查的除笔者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巴哈尔和吐尔文江·吐尔逊两位副研究员、杨富强助理研究员。

地维汉关系的描述与分析,所以实地调研是这个课题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课题是2007年立项的,调查是在2010年做的,因为期间我有一年的时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社会学院做访问学者,2009年回来后又值乌鲁木齐市发生“7·5”事件,到南疆的调查最后推到2010年的1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把相关的文本资料、人口数据、研究状况,包括过去20年在南疆历次调研的笔记都翻阅过了,加上自己从小在南疆生活的经历,对所研究的对象已经较为了解。但一次专门的系统的调查,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人类学调查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是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有学者把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这是相对于在实验室准控制状态下的研究来说的。由此,社会学调查中的实地观察、现场访谈也被称为田野调查。

在课题立项之初,我就想着调研将是完成这个课题最关键的环节,用什么方式去做,怎么做,一直困扰着我。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听了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方法课,他所说的定性调查成为我在实施课题调查中尽力想学习和仿效的。潘教授认为,定性调查有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方法:求同法(调查不同对象的相同方面,然后得出其共性)、求异法、求全法(针对一个研究对象所进行的全息与全程的定性调查,即通常所说的“个案研究”)。他所推荐的求异法,“就是要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想当然的某个现象的现实状况,其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或者努力去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因此,调查了多少个人毫无意义,唯一的价值在于最终发现了多少种不同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到没有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调查就终止了。”这种“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方法要求,选择“信息最丰富”的调查对象,以获得与研究主题相

关的所有潜在信息。^①

我的计划是在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地区各选3个县,综合考虑到各县汉族人口迁移情况、居住情况、产业情况以及调研的交通路线,最后选择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沙雅县、温宿县,喀什地区的巴楚县、莎车县、泽普县,和田地区的和田市、洛浦县、策勒县,最后在民丰县尼雅镇巴扎也进行了一些观察和访谈。

在这次调查地点及调查对象的选择中,我们就尽可能采用“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方法,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更丰富的资料。调查点主要是根据相关文本资料、过去的调查、当地干部推荐等几种形式选择,以点的差异性为首要选择标准。其差异性体现在: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或种植业方式,如棉花(沙雅县塔里木乡)、水稻(温宿县托乎拉乡)、园艺(叶城县园艺场)、蔬菜(和田市古江巴格乡)等;汉族农民相对于维吾尔族农民不同的居住形式,如聚居(如泽普县赛力新村)、混居(如库车县莫玛铁热克村)、散居(如古江巴格乡七大队);不同的体制,如村、农场(叶城县园艺场)、农场改为村落(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距离城镇不同的距离,如邻近城镇的(和田市古江巴格乡、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等)、乡镇边的(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巴扎村等)、偏远的(库车县塔里木乡苍塔木村);不同的建村时间,有60年代建的(策勒县托万托格拉克村)、70年代建的(巴楚县英也尔村)、90年代建的(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等等。调查对象主要为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有固定人口、流动人口,有本地农民、外来包地及打工人、商店老板、乡村医生、磨坊主、酒吧老板等。尤其重视来当地时间较长的老人,他们对信息的掌握更加全面。

当然,由于调查对象是村落,而在没有进入调查点之前,我只能了解到县甚至乡镇这一层级,对村落并没有多少了解,只决定尽可能地

^① 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寻找不同,避免在相似的地方进行调查。实际上,社会生活千差万别,两个点的不同和它们之间的相同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他们的同与不同,即使是情况较为相似的两个调查点,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就尽可能寻找它们的不同,使相关信息最大化。

如何进入调研点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论做什么事,好像都需要关系,搞社会科学研究,也往往离不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外乎有两种好处,一是为进入社区调查提供合法性和官方配合;二是希望地方政府提供食宿,甚至交通工具的方便,节省调研费用。由于有课题经费的支持,后者完全由课题自理,所以对我们并不需要。但前者却是必须的。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情况较为特殊,所有外来的采访及调查,都应该和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打招呼,否则即使进入调查点也可能受到乡村的干预。这次调查在和田市就曾遇到一点麻烦。由于我们两个多月前刚去过和田市古江巴格乡,这次调查再去时是周六,就没有和市里及乡里的领导打招呼,在和田所叶林的陪同下直接进入乡里一个新建小区,主要安置的是拆迁的汉族农民。没想到这里居民意见很大,半年前曾经因为拆迁还与派出所人员发生过小规模肢体冲突,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怨言与不满。当我们离开时,遇小区保安的盘查,经再三解释才得以脱身。当然,得到官方的配合就可能会有一些代价,如因为领导的意愿而改变调查者的选择,或者因为他们善意的安排而使调查多了一些干扰因素。虽然我们这个调查是进入村落、进入农户家庭,并不需要更多的官方资料,但作为经常从事调查研究的人,还是很清楚这些程序上的要求,所以需要与当地政府打招呼。

由于缺乏私人关系,所以我们完全走官方的程序。从新疆社会科学院出来之前,我就在院办公室开好了给各县政府办公室以及所要去的乡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证明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希望给予配合。一路上我们走了10个县市,基本是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先到县政府办公室报到,由县政府办给乡领导打招呼,我们再到乡政府,说清来意,并简单了解乡里生产情况和汉族居民的分布,确定村落调查点。乡里

再和相关村的村长或支部书记(一般都是双肩挑)打招呼,再有一名乡干部陪同我们前去调查。只有莎车县我们没有到县上。我们的调查点荒地镇离县城50多公里,按行程先到镇上打招呼。我们拿着介绍信直接找镇党委书记,书记派一位副乡长陪同我们,还管我们一顿午饭。这个用汉语“荒地”命名的镇,据介绍只有零散的汉族流动人口,农民中没有一个汉族常住人口。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的是,这个不大的镇上那家食客满满的饭馆中抓饭的美味,在新疆生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顿饭后好像对于其他抓饭的记忆都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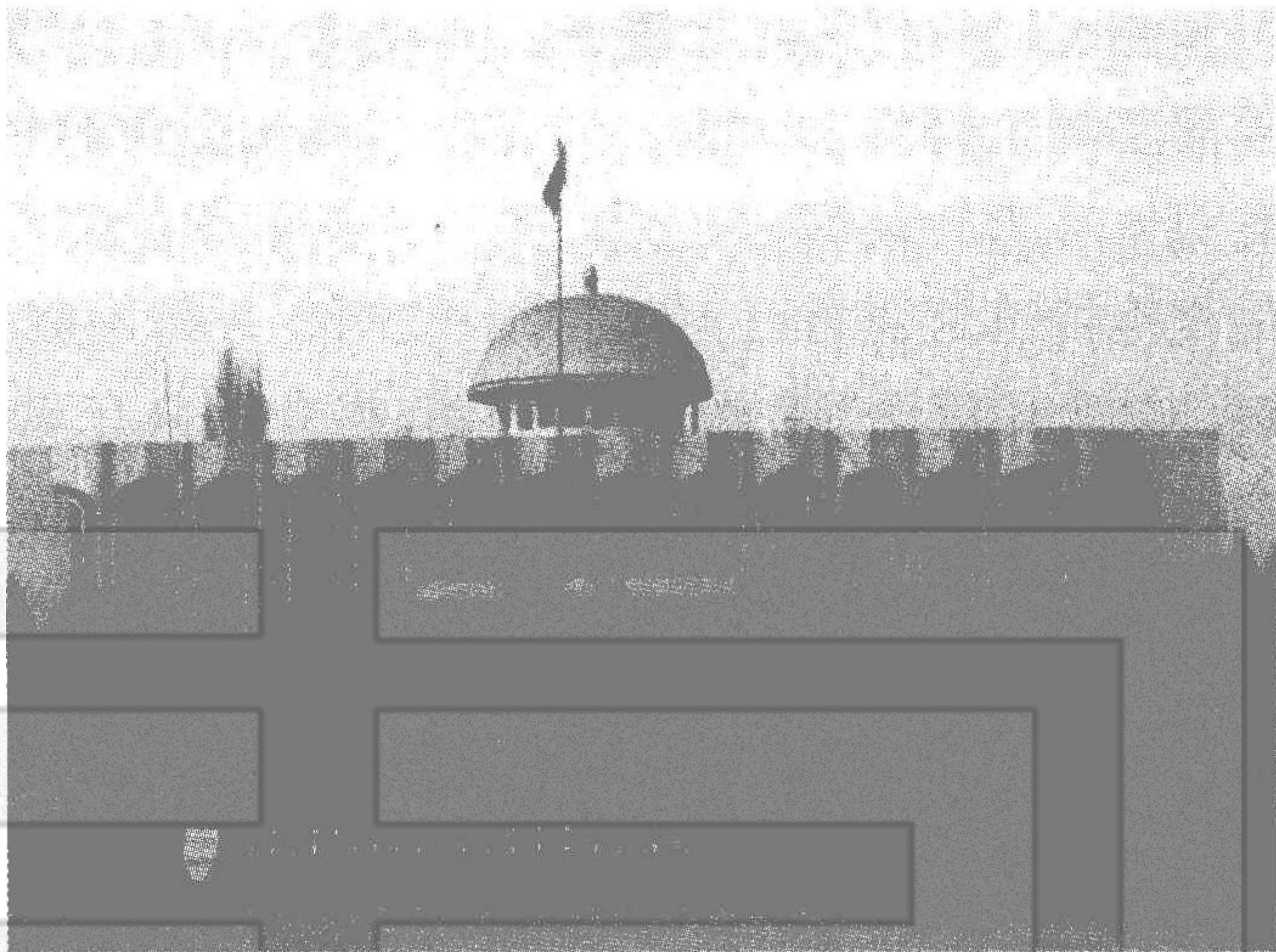
其实在巴楚县时我就一直犹豫是去麦盖提县库尔玛乡,还是去莎车县的荒地镇。荒地镇是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1997年曾调查过的地方,那里汉族流动人口多,常住人口很少,适合我们调查流动人口。而麦盖提县库尔玛乡曾经有个红光农场,据《麦盖提县志》记载,1990年该乡有1万人,汉族人口达0.25万人,是麦盖提汉族聚居最多的乡,占全县汉族人口10.93%。当时乡里有汉族中小学各1所。但在巴楚县打听的结果,从巴楚县到麦盖提县的路不好走,只能放弃库尔玛乡,直接走215省道到莎车县的荒地镇,用大半天的时间,走了镇上七八户汉族人家,有种大棚的、开诊所的、开磨坊的、开酒吧的,他们一般还包地耕种。调查所获颇丰。

当时新疆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在温宿县挂职,担任县委常委,负责农业工作。他当时并不在县上,但给有关的领导打了招呼,于是这成为我们一路调查中被礼遇的规格最高、最顺利的调查点,乡党委书记亲自接待,调查点的负责人全程陪同,走了三个点(汉族聚居菜队和稻泉农场,以及有3户汉族农民散居的六大队1小队)。

在和田市,有社科院与和田地委共建的和田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过去曾在所里工作,后来调到其他单位的叶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两年,每次到和田调查我们都会找到他,不管他在与不在研究所工作,这已经是一种私人的友谊了。他给洛浦县、策勒县的宣传部都事先电话通知,我们的接待规格也被提高,县里的同志也要陪同。

过去调研我经常会感叹社会科学院下面没有腿,走到基层无人理

会,甚至无人知晓,却经常被老百姓当做记者,因为我们也到处找人问问题,拿着个本子不断记录。一些老百姓就以“记者”相称,谈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或自己所受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在媒体中披露出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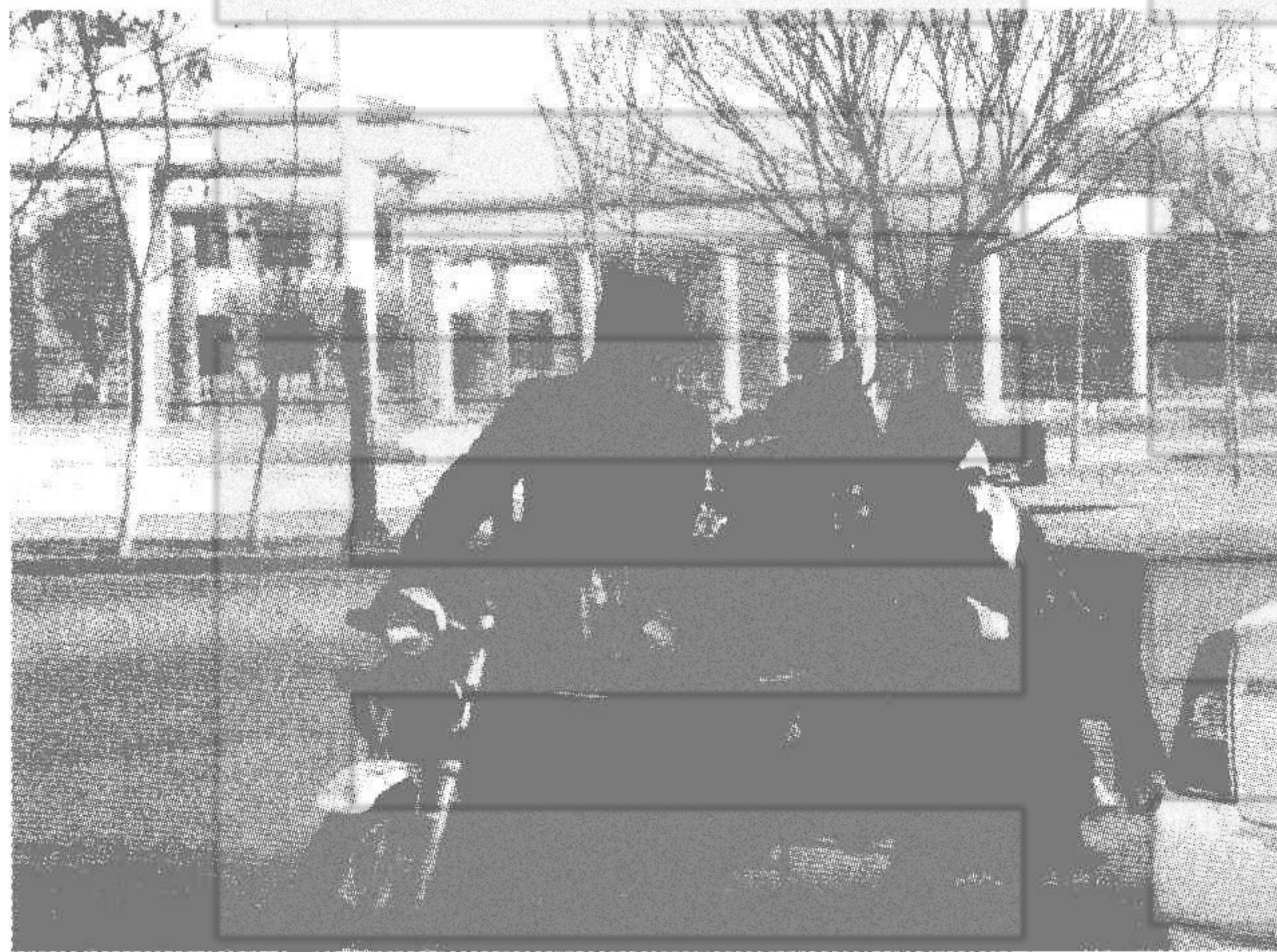


温宿县托乎拉乡政府办公大楼。

同“焦点访谈”一样。他们相信媒体记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每每令我汗颜,感到有愧他们的重托。这几年,社会科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增大,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对社科院有所了解,甚至在乌鲁木齐接受各类培训时,有的也听过社科院的专家讲课。所以这次调研我们只拿着介绍信,没有给领导打招呼,没有事先安排,上路时还惴惴不安的,但一路走过,发现县乡的领导对我们都很客气,基本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只有在巴楚县,我们用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与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周旋。当时县里领导在开会,虽然县里的秘书们似乎也很想给我们行个方便,帮我们联系乡里领导,但不知是因为我们来自社会科学院的身份,还是办公室主任特别地慎重,一定要等到县领导的指示。副主任领着我们在楼上楼下找了一圈领导未果后,歉意地让我们等待,主任明说,如果没有领导允许我们去了也没人敢接待。由于计划中的调查点距县镇有40多公里,一旦空跑成本会比较高,只好听从县办的安排。直到天色已晚,县政府都已下班,领导们的会议终于结束,见到了县长、副县长。领导们直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同意去调查,二是建议选择阿克萨马热勒乡(又称“毛拉”乡)替换原来我选的阿拉格

尔乡,理由是该乡汉族人更多,距县城又较近(距县城40多公里,阿拉格尔乡距县城60多公里)。还让办公室给我们安排了一顿晚餐,请了县民宗委主任来陪我们。此事令我感慨,领导们事无巨细都悉心操持,肯定很忙很累,属下上上下下请示,自然也忙也累,只是效率低下,让人无奈。而我当初选择阿拉格尔乡,除查了人口普查数据知道该乡汉族人口也较多外,还因为它距县城远但距色力布亚镇近,可以住在镇上。色力布亚镇位于巴楚县西南部,距县城86公里,南邻阿拉格尔乡,人口5万左右,一半是城镇人口。交通便利、民族手工业发达,商贸流通业繁荣,是闻名遐迩的南疆四大农村集市之一,“巴扎”各地客商云集于此进行贸易,日人流量可达10万人次。但县里同志一再说那里住宿情况很差,或者基本上就没有住的地方,他们从来都不在那里住,晚上都是回县城的,“你们,从乌鲁木齐来的……还是回县城住好。”于是我们换了点,晚上回到县城享受宾馆的热水和干净的床铺。



于田县街头。

我们在泽普县调查时,由于调查人员中和一乡有点关系,打算选择一乡,县办主任请示了常务副县长后,领导也表示认可。当主任给乡领导打招呼时,乡领导一再推辞,站在电话机附近的我清楚地听到话筒里传出的乡领导的声音。该领

导说,一乡是城郊乡,情况复杂,城镇扩大拆迁之事主要发生在一乡,农民意见多,情绪大,不适合调查。主任放下电话很抱歉也很严肃地说,不能去一乡,如果我们坚持去,就需要请示县委书记。我也知道谁也不会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给人看,而我的目的并不是去调查拆迁纠

纷、干群关系等,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换点,提出去四乡。

由于县里的电话,到了乡里,一般会有一位主管领导接见我们,稍作交谈后,就委派一位乡干部(通常是副乡长、副书记等)陪同我们到村里。村干部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安排。我们向村干部们提出,希望找来得早的、了解情况并头脑清楚,记忆力好、善表达的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老人,也可以是善表达的中年、青年人,希望身份是多样的,如村干部、专业户、教师等。在进入第一户后,根据访谈的情况,再自己寻找下一户人家。只有在库车县齐满镇,镇领导直接叫来调查点的支部书记,让他领我们去村里。到村里后,支书也很快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再跟随我们。调查对象的选择就完全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气氛也很宽松。我们几个人都曾被村民们围住,他们反映了许多问题并表达不满,主要是针对村干部作风和干群矛盾的,还有孩子上学困难、学校教育质量差、农补措施不到位,等等。

乡村干部为表示他们的重视,往往要跟随我们去调查,有的干部也是怕农民说一些他们不愿让外人听到的事,在旁边以便控制局面。但乡干部有时也能提供更多关于调查点的信息。在巴楚县,我们就接受了陪同的乡干部的建议,去了两个村,一个是汉族村落,一个是维汉混居村。维汉混居村中主要是维吾尔族人口,但支书兼村主任是位汉族农民,是村民们选举的,他从小在南疆长大,维吾尔语很流利,在村里很有威信。为了探访他,我们特意将这个村作为调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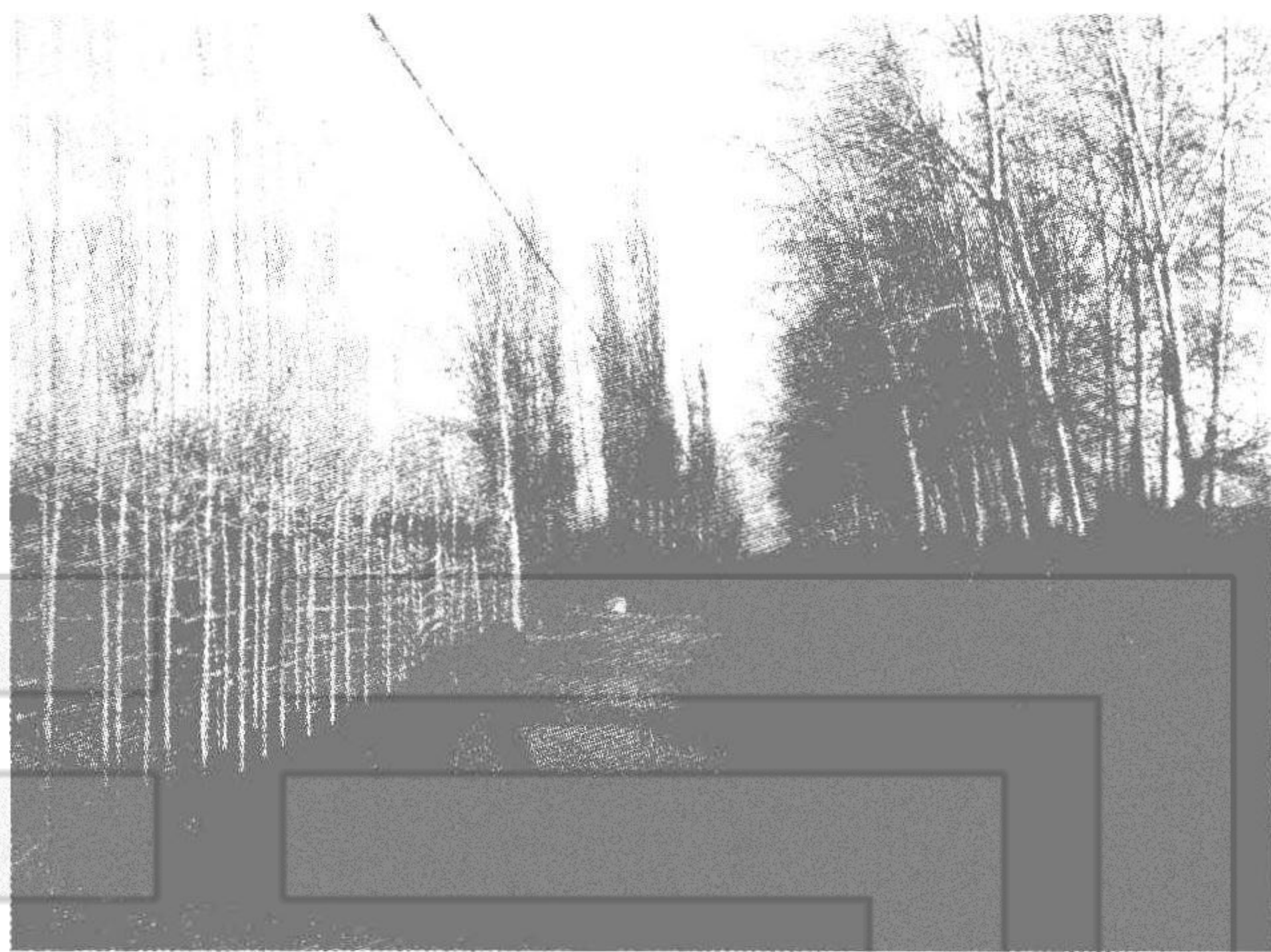
在对普通村民调查时,村干部在旁边实际是有利有弊。利处在于:谈到生产状况、家庭收入、收费标准、义务工、村落收费等,村干部往往更清楚,在旁可注解、可纠正、可讨论,还会对被访者不愿说或忘记说的给提示。但这也就有了相应的弊,使普通村民不愿说或不能说。也有干部在旁一言不发,有的只是纯粹地陪同,对话题不感兴趣。我因为是调研组负责人,乡村干部往往跟着我,其他调查员也就有了自由寻访的时间。在叶城县园艺场的调查,最受干部们重视,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老场长先提了几个人的名单,基本每个调查员都有带路人跟着。往往在调查完第一家后,带路的人都有事离去了,调查员

自己根据情况走第二家。但场领导很负责任,基本全程陪着我,也推辞不掉。为我确定的调查对象倒也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有分场干部、曾经的牧羊人、培养了两个大学生的农场职工等,各有特点。只是当四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坐在一起和被访人聊他个人的生活和收入时,我自己都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在洛浦县,在访问一对维汉通婚的夫妇时,陪同的县、乡、村干部正要坐下,我就很客气地说:有些话题比较私密,人太多不好说,他们都非常理解,立刻全部离去。但对于其他人的调查,如果陪同人员对我所说的“不用陪”、“你们很忙去忙你们的事”之类的事无动于衷,或者热情地表示陪同我们就是他们的工作时,我就不再拒绝。好在我们的调查内容也不是敏感话题,被访人一般说话还是比较爽快。有时在谈及族际关系时,为了保证话语正确,普通被访人对是否有在场的乡村干部还是比较在意的。

尽管我们认为自己也是平民百姓,而且尽可能地不打着官方的旗号扰民,只是做一个普通的社会调查,但基层干部对我们很热情,有时使用接待上级领导的方式。去叶城县园艺场三分场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大概前一天下午场领导就安排分场的人早上在村里满是浮尘的土路上洒水清扫迎接我们,而我们去的有点早,或干部们安排的有点晚,进村的时候正是尘土飞扬尚未落地的时候,这使陪同的场领导感到有些没面子,批评分场干部们也格外严厉。到策勒县的托万托格拉克村时,有人正在清扫村委会的院子以及前面的道路,我还多问了一句,是有领导来吗? 50多岁的村支书憨厚地笑着,说是我们要来。这令我很不好意思。在社科院从事调查研究多年,如果不是跟着领导一起下去,对于基层的热情总有让人承受不起之感。

我们这个调查组我认为我是最佳组合,两维两汉,两男两女,可分可合,各有特长,都有与人交往的技巧、耐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我们基本都是四人分四组,一个上午一人一般走两到三户,一户调查时间从半个小时到两三个小时,取决于被访人提供的可用信息量和他们的时间。有时候就在村头、商店、农户家等被一群人围上,七嘴八舌,这样的情况大都是反映问题了,与我们调查目的不符。

调查员的经验与组合,决定了调查的顺利程度。吐尔文江副研究员驾着他的私人汽车,兼调查员、司机、管账等多重职责,并充分发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与人闲聊的特性,往往我们入户了,他在村里漫步,观察村庄情况,碰到方便的人随意



进入策勒县托万托格拉克村调查。

聊几句,经常能听到我们正式调查中未闻、未见之事。巴哈尔副处长、副研究员很擅长和被访人聊天,从婚姻、家庭、孩子、生活等到人际关系、族际关系,他主要调查维吾尔族居民,了解村里或与汉族村落邻近的维吾尔族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汉族农民相处的感受。杨富强助理研究员最年轻,工作主动,为人谦和,尤其是南疆汉族农民中甘肃籍的人较多,经常遇到老乡,用他的甘肃方言和被访人套同乡情谊,很容易就进入打成一片的状态。我一般都和村里干部聊,所以对村里整体情况掌握较全面,而且作为课题负责人,我对这个调查的重点了解最清楚。每次与他们碰头时就需要及时了解调查进展情况,及时调整被访人及访谈要点。饭桌上、行程中、宾馆里,都是我们讨论进展和布置下一步工作的地点,每晚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情况交流会。

我们4个调查人员坐一辆车,由乌鲁木齐市出发,走314国道向西,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先到库车县,再到沙雅县,从沙雅县到阿克苏市。温宿县距阿克苏市仅12公里。然后继续沿314国道西行,从巴楚县上215省道到莎车县再上315国道,沿盆地西缘经泽普、叶城两县到和田市,沿盆地南缘走315国道往东走,从洛浦县到策勒县走的是216省道,调查了拜什托格拉克乡,到民丰县后沿第一条沙漠公路向北直到轮台,上314国道向东走,住库尔勒市,次日回乌鲁木齐。基